

国家图书馆于9月15日至10月31日举办“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200余种文献、100余幅图片，展现了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期间各阶层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富强不断探索、勇于奋斗的历史画卷。

清王朝最后的喘息

——从史料还原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之细节

本报记者 屈 茜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历时268年的大清王朝在这125天里土崩瓦解，轰然倒塌。这期间，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一方面利用清军压制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养“敌”自重威胁清廷，最终逼清帝退位，坐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然而，袁世凯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和平”逼退清帝？这个过程中清廷内部又有怎样不同的应对态度？“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中的文献和史料，为读者呈现了其中的一些细节。

当时，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见大势不佳，重新起用拥有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的袁世凯，在1911年10月14日诏授他为湖广总督，赴武汉节制各军。最初，袁世凯称疾不就，向清廷提出要求；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10月27日，清廷又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各军，隆裕太后还拨内帑100万两济武汉军事。接着，清军在汉口击败民军，清廷看到袁世凯是可以扭转乾坤的惟一人物，便于11月1日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诏他来京，组织内阁。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正式成立，自此便独揽了清廷的军政大权。

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民军死伤3000人。当时冯国璋打算乘胜渡江攻武昌，袁世凯却亲自披挂长途电话授意冯国璋停止攻打。依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完全可以镇压革命，但是他要养革命以制朝廷。12月28日，隆裕太后听从袁世凯的进谏，下懿旨召集国会，以决定国体。《绍英日记》中记录了袁世凯见面隆裕太后时的一番对话：

皇太后垂泪谕袁总理大臣云：“汝看着应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

袁对云：“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请上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



绍英像

须有餉，现在库中只有二十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决战亦无把握。今唐绍仪请召集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固属甚善；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如开战，战败后，恐不能保全皇室。此事关系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为商议，候旨。”

绍英时任署度支部大臣，长期位居清廷核心的他亲身经历了晚清的动荡，并记述在日记中。《绍英日记》由绍英的儿子马士良保存研究，今通过绍英之孙马延玉修复并转予国家图书馆，在“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中首次展出。

在《袁氏当国》一书中，作者唐德刚把袁世凯的政治方略解读为三步，即养敌、逼宫和摊牌，“袁



《绍英日记》

氏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鬼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还是做总统，都少不了他一份。”

对于隆裕太后，袁世凯首要一步就是以军费无着为借口，上来便把太后的私房钱，逼掉一百万两，等到太后以为内帑花光，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袁世凯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一年四百万两，足可安度晚年。

而清朝皇室方面，主和派、主战派则争论不休、斗争激烈，庆亲王奕劻保袁世凯出山，是主和派。载洵、载涛属于不发言者。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镇国公

载泽、蒙古王那彦图、满族中之升允、铁良、良弼等人则属于主战派。对于当时袁世凯停战言和，主战一派非常不满。在马士良早年手抄收录的《恭亲王溥伟日记》中，记录了1912年1月15日，恭亲王溥伟在内阁会议上与袁世凯离去的赵秉钧、梁士诒进行的激辩：

内阁会议，余力疾至内阁，醇、庆诸王及蒙古王公均到。袁世凯以疾辞，遣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最可愤者：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话，不提及国事。余不能耐，遽诘梁、赵曰：“总理大臣之余等会议，究议何事？请宣言之。”

赵秉钧曰：“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余曰：“朝廷以慰庭（袁世凯

字）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乃罢战议和，此何理耶？”

梁士诒曰：“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餉无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皇上也。”

余曰：“以前发捻之事，抚及畿辅，用兵几十年，亦未有议和之举、另设政府之谋。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何乃辄议如此？若用兵筹餉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若遇贼即和，人尽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庭耶？”梁、赵语塞。

面对气势汹汹的主战派，袁世凯自有手段。当时袁世凯以军餉缺乏为由，说动隆裕太后要求王公大臣“毁家纾难”。清廷无奈，只好下谕：“著宗人府通知各王公等，将存放私有财产，尽力购置国债。”以号召皇族全力购买国债，支援军用。可纾难虽人人之所欲，毁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实际上在京城内，皇族没有几个人响应。经袁世凯这一倡导，满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轻言对革命党作战了。

此时的清廷早已奄奄一息，而待到孙中山做出清帝退位后辞职的承诺后，袁世凯才决定把清廷推翻。1月16日，袁世凯内阁全体成员联名上“合同密奏”，袁世凯亲自出马说服隆裕太后，请求清帝退位。1月17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集王公大臣，举行第一次御前会议，商议清帝退位的事情。此时的隆裕太后摇摆不定，尽显软弱。《恭亲王溥伟日记》记录下

了当天太后同王公大臣们的对话：

太后问曰：“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皆对曰：“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

太后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餉，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两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始谓革命党本是老百姓，因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洋是否这样说？”

醇王对曰：“是。”

臣伟对曰：“既是奕劻这样说，现在载洋已然退政，外国何以仍不帮忙？显系奕劻欺罔。”

那彦图奏曰：“既是太后知他如此，求嗣后不要再信他言。”

臣伟奏曰：“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求发餉三月，他情愿破贼。”

太后问载泽：“有此事否？”

载泽对曰：“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餉，派他去打仗。”

太后谕：“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

臣伟碰头奏曰：“库款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餉紧要，餉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貽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銀器赏出几件，暂充兵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胜仗，则

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

善耆奏曰：“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太后谕：“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

1月26日，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的激进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北京的王公大臣为之大震，纷纷逃亡，隆裕太后恳求袁世凯保其母子性命。就在当天，段祺瑞等清将领50人联名通电，请清帝退位。电文意思明确，那就是清帝退位，设立共和制的政体，并由袁世凯组织新政府。此时，受到重重打击的隆裕太后已经彻底地放弃希望，不再等召集国会，决定先自让政权。

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清朝至此正式结束。随后，孙中山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世凯继任。此时，袁世凯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这样表达，袁世凯发起的“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未可厚非”，以和平的方式逼退清帝总比“火光四起，尸横街巷”要好。但是，与千万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民族使命相比，袁世凯所争的重点更多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

在马士良1981年发表的《清廷退位前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反映的是袁世凯在逼帝退位后立刻“翻脸”，而隆裕太后则恍然大悟却又万般无奈。当时，袁世凯派张謇拟定好逊位诏，并催促清廷加盖玉玺。次日早朝，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禀告民国对皇室优待费，每年四百万两，并哭着说：“请皇太后好好教皇上念书，将来还有还政之一日。” 出殿时，声犹哽咽。隆裕太后回宫后对近侍说：“袁世凯真是忠臣。”第二天早晨，太后冠服整肃等待早朝，可到10点钟还不见军机王大臣上朝，于是隆裕太后亲往慈宁处上来回话，她万万没想到得到的回答竟是：“袁世凯昨已临行时言语，从此不来矣。” 太后听后，目瞪口呆，半天才缓过神来，说道：“难道大清国我把它断送耶？”

回望民族复兴路上的先行者

——“东方的觉醒”历史文献展访谈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屈 茜

策展人: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 李世田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 孙 俊

国家图书馆“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通过馆藏文献资料向今人回顾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珍贵文献为主体的辛亥革命纪念展。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展品及其背后的故事，本报记者邀展人员一起，对较为重要的文献和关键历史人物进行解读。

主持人: 林则徐因为主持翻译《四洲志》而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此次展览也展示了此书，当时翻译此书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陈红彦:《四洲志》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组织人员编译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概况的地理志书。1839年清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意识到军事改革的必要性，开始秘密购买、仿造西式武器，同时组织官兵演练。林则徐还率先以开放的视野看待西方，翻译西方书刊，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史和富强现状。在他的带动下，一批开明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接受西学，从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四洲志》是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的蓝本。

主持人: 詹天佑当年在耶鲁大学的毕业论文原稿《论大码头的起重机械》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可谓难得一见。詹天佑有怎样的留美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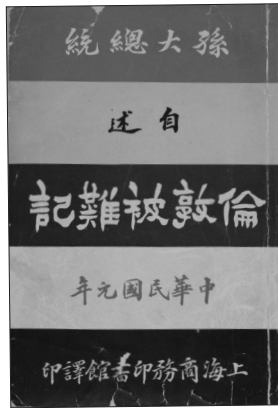
李世田: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地方督抚以及恭亲王奕訢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了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中出现的西学人才短缺现象，使曾国藩、李鸿章等意识到派遣留学生学习的重要性。1870年，在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容闳建议下，清廷批准成立总理衙门下属洋务总局，同时在美国设立选带幼童赴美洋务局，负责办理选带幼童赴美留学事务。留美幼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选派留美幼童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声。

孙俊: 大家熟知的“中国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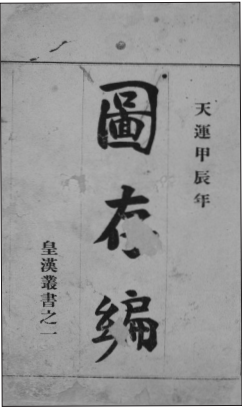
之父”詹天佑就是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当时，他的父亲詹作屏出具了保证书：“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美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1872年8月11日，包括詹天佑在内的首批30名年龄10岁至15岁的留美幼童，在上海登船，横渡太平洋，前往旧金山。初到美国的詹天佑，寄住在校长诺索布家中，先后在康奈狄克州威士哈芬小学、绍哈芬的希尔豪斯中学学习，成绩优异。1878年7月，詹天佑考入耶鲁大学雪菲尔德理工学院土木工程铁路专业。在三年的大学生活中，詹天佑刻苦攻读，两次获得数学奖。1881年，他完成了毕业论文《论大码头的起重机械》，这份毕业论文的英文手书原件由詹天佑之子詹文裕捐赠国家图书馆。本次展览还展出了詹天佑《川汉路信底函稿》一册，为詹天佑主持修筑川汉铁路期间写给颜德庆等人的英文信函底稿，内容涉及川汉铁路宜万段沿江路线的选择、机车选型、码头缆车设计定制等。中华民国成立后，詹天佑还曾协助孙中山先生制定十万公里铁路计划。

主持人: 康有为的《大同书》手稿此次呈现给观众，《大同书》的诞生历程是怎样的，反映了康有为怎样的政治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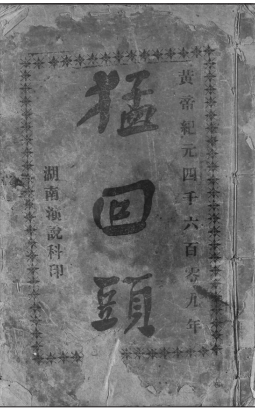
陈红彦: 此次展览中的康有为《大同书》手稿为天津图书馆收藏。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使得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走上历史舞台，并在“戊戌变法”中担当起了领导者角色。其实早在1884年康有为就开始酝酿“大同”理想，



《伦敦被难记》



《革命军》伪装题名本



《猛回头》



《中国女报》

1887年他编著的《人类公理》便是《大同书》的前身。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1901至1902年在他旅居印度期间，《大同书》基本完稿。1913年，康有为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部发表于《不忍》杂志。1919年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大同书》。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大同”一词出自《礼记·礼运篇》，康有为从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学说中汲取思想资源，同时融合了西方的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与平等博爱的政治理念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希望通过“大同”的道路实现富国强民，摆脱民族危机。

主持人: 此次展出的孙中山著作《伦敦被难记》也是较为重要的一本文献，这本文书记述孙中山怎样的经历，在当时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李世田: 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在檀香山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10月，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失

败后流亡海外。清政府派出大批暗探到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等地进行追踪，并通报亚洲、美洲、欧洲各国公使密切注意缉拿，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还专门雇请外国侦探暗中侦查。孙中山几经辗转，于1896年9月30日抵达英国，第二天即遭绑架，被秘密囚禁于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三楼。孙中山被囚后，为争取自由进行了各种斗争。经过他耐心细致地工作，看守人员将他被囚信息告知孙中山的英国教师康德黎。在康德黎等人的营救下，当地报纸《地球报》以《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公使馆之拘囚》等文报道了孙中山被秘密逮捕一事。《中央新闻》、《每日邮报》也竞相采访报道此事，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得到了英国人民的情愿与援助。经英国方面干涉，孙中山最终获救。伦敦被难事件使孙中山名声远播，其革命者的形象从国内走向了世界，孙中山成为国际知名人物，得到各国正义人士的支持与同情。

孙俊: 伦敦被难事件也推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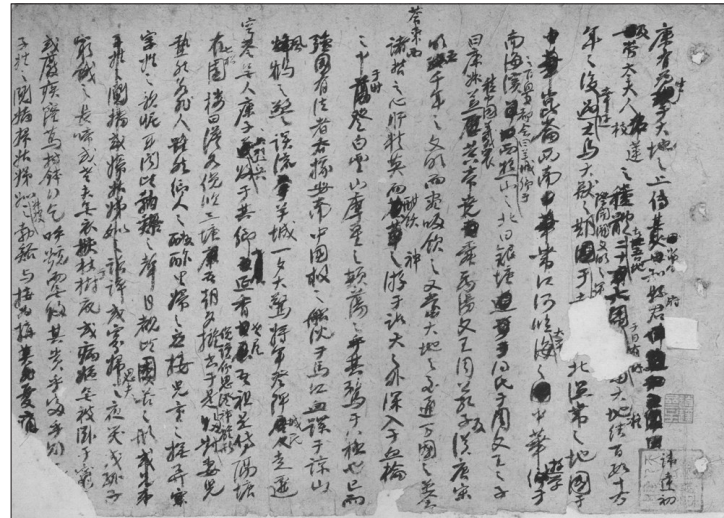
促进了孙中山的思想发展。伦敦被难后，孙中山更加明确了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体系。孙中山撰写了《伦敦被难记》，对伦敦被难事件做了详细记录，揭穿了清政府的谎言，并进一步阐发了他的革命思想。该书用英文写作，于1897年初在俄国布里斯特耳出版发行，后被译成俄、日、中等国文字。国家图书馆这次展出了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伦敦被难记》。

主持人: 此次展出文献中有《革命军》的1903年版本及1904年伪装题名本，这些早期传播革命思想的著作在当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李世田: 思想的启蒙是革命运动的第一声，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许多年轻人正是阅读了宣传革命的刊物著作后才加入反清革命事业的，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大的首推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及邹容的《革命军》。《猛回头》、《革命军》作于1903年，均用白话文写成，通俗易懂，便于记诵。《猛回头》剖析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急形势，揭露了清朝政

府的腐败无能，倡导新生活、新思想，具有开启民智的重要意义。《革命军》被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书中热情宣扬革命，号召人民打倒清政府、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国，此书风行海内外，成为动员革命的“教科书”。本次展出有《猛回头》1912年的铅印本、《革命军》的1903年版本及1904年伪装题名本。

孙俊: 除著作外，当时还有许多鼓吹革命的刊物，如《民报》、《汉帜》、《浙江潮》等。著名女革命家秋瑾主编过《中国女报》，在宣传革命的同时提倡女权，为女性争取社会地位。秋瑾在1907年筹划起义时因事泄被捕，壮烈牺牲，成为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全国性女性。我们这次展出了多件有关秋瑾的展品，如《中国女报》创刊号，秋瑾牺牲后革命同志为纪念她而出版的《流血女杰秋瑾》、《鉴湖女侠》等。



《南海先生大同书稿》 天津图书馆馆藏